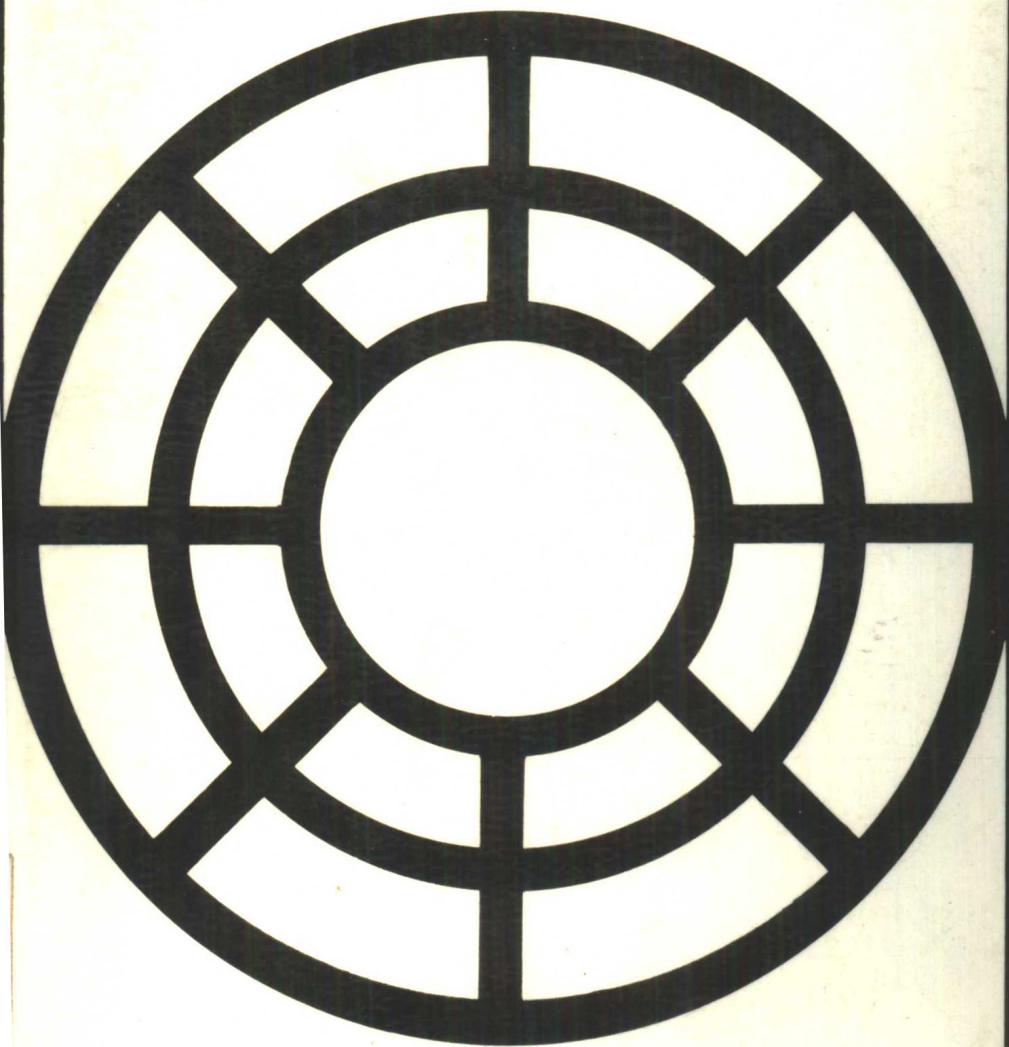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建築

與周易哲學

程建軍／著



百川學海

百川學海

中國古代建築與
周易哲學

程建軍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

程建军 著

责任编辑：刘世国

封面设计：曲 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8插页 229 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数：1—4 312册** **定价：6.0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365-6/B·17**

序

徐伯安

建军同志的《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一书，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某些非技术性（或非物质性）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也恰恰是区别中国古代建筑同其他体系建筑的决定性依据。

从现有考古资料分析，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原始人建筑，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它们的群体（原始人群的聚落）、个体（原始人对偶婚住宅和公共活动的大房子）、结构形式（深穴、浅穴和地面建筑）、材料做法（用石刀、石斧砍伐得来的自然形状的树干、树枝，掺有草茎的灰泥）和细部构造（用草绳或藤条进行木件结合的绑扎方法）等等，简直如出一辙，一模一样。我以为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始人建筑称之为“大同型建筑”。这种“大同”大约是由于建筑处于人类初期相同生产能力和相同认识水平之上的缘故。尔后，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制社会以来，有了文化的差异，建筑也开始有了不同。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个不同是随着历史进程，朝着愈演愈烈，一发不可弥合的境地发展的。不同文化孕育着不同的建筑。这或许又可以把这些建筑称之为“文化型建筑”。它们如同原始人的图腾一样，成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不同标志。建筑的历史也因此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文化型建筑”取代“大同型建筑”是历史的必然。原因是当人类有了足够能力去驾驭建筑技术和制造建筑材料时，人类的建筑活动已不再只是“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的功利之举，而且还有了各种各样精神上的追求。建筑成了既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同时也成了“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物化形态。人们开始把建筑当做天地间最伟大的人文工程，当做自我生存的理想环境和意志的象征。人们主观地赋予建筑许多社会性、哲理性和人格性。几乎无例外地，从建筑的形式语言到空间氛围，无不浸透着这种赋予的文化魅力。建筑有了全面的文化意义。

《易经》和《易传》，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人心中，它是天地万物无所不容，无所不能阐释的。所谓“易”原本日月两合以象宇宙也。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层次和行为方式。汉语中“容易”一词，或许就是缘此而来。凡事容于《易》，便找到了体察该事物的理论依据，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如此这般，人们处理起事物来就变得“容易”了。这大概是我们先人造字组词时的一种心态吧，但也未必没有道理。

长期以来，人们苦于找不到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甚至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建筑理论。两部历史地位显赫的建筑巨著——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虽说日本学者竹岛卓一氏称它们是中国古代建筑著作的“双璧”^①，梁思成先生称它们是“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②，但它们毕

① 《世界建筑全集》4，第89页。

②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

竟只是建筑规范、定额一类管理用的条例而已。从中悟不出什么可以发挥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方面面，容于《易》这个文化大框架（或大系统）之中，便不难找到它的理论依据和阐释角度。这一点，近年来已被建筑史学界一些有勇气的仁人志士体味到了，写了不少文章，有的还写得很有内容和深度，令人读了耳目为之一新。然而，公开用书的形式系统地做文章，建军同志还是第一遭，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是难能可贵。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说三道四，甚至骂街。什么牵强附会，胡诌八扯，故弄玄虚，没事找事，庸人自扰，等等。总之，罪名还是蛮多，蛮吓人的。但是，骂人者有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没有搞清楚，或者他们不想去搞清楚。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就是我们的先人，确实确实是把建筑容于《易》这个文化大框架中来进行经营的。这可由不得我们后人的认可与否。我们尽管可以不去理会这个中的奥秘，硬是扭着来，那么，等着惩罚我们的将是对古代建筑中好多现象背后的玄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

举个最一般的例子，如风水或堪舆之学（被市俗化了的《易》学），似乎就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极大影响。从城市选址，到住宅取向，到坟茔相地，哪一样也没少了用风水或堪舆之学进行论证和风水先生的“折腾”。一个带有指南针的罗盘，一副玄妙莫测仪态可鞠的风水先生，合在一起却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折服了，甚至“走火入魔”。设若这风水里全然是些胡诌八扯，那我们的先人也未免太有点“那个了”。剔除那些风水里的迷信成份，其中还是有不少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关系认识的科学道理或经验的。如果人们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肯定会有所发现，也肯定会对破译中国古代

建筑某些现象有所建树的。如若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的妖术邪说，那岂不等于吹灭了灯笼去摸黑寻路吗？当然，掉进去也跟着迷信起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记得在五台山中曾见到过一种情况（或做法），大部分寺院东南角上都有一处高家伙。这个高家伙，可以是建筑也可以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要高得起来就行。什么幡杆、灵塔、经幢、山石、大树，都可以。山里最大的寺院——显通寺东南角上搞的是座五层粮仓（现改为文物展览室），高是高了，打从一进台怀镇南山口就能望见它，但它外观上封闭、蠢笨，不好看，有些让人无法忍受。从形式美角度看，确实要不得。不好看，无法忍受，也得要，更不能拆掉。据说这是由风水决定的，拆了就会断了所谓寺院的香火。看来释门净土也吃风水这一套。风水的威力在中国这块传统文化土壤上高过了佛祖的大彻大悟。《易》学对释门净土的渗透，早在“唐李道玄以《易》注《华严》”便开始了。应该说有些年月了。山里也有搞得好看的，举如大塔院寺的山海楼，建筑上的轻重、虚实，高低、宽窄，处理得就十分妥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很漂亮。面对一个难看一个漂亮的两个高家伙，怎样去分析它们在寺院的总体布局上，天际线的起伏变化里，空间场所的深层寓意中的道理呢？舍去那个由风水引起的做法，就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了。即令说了也是牵强附会，真是胡诌八扯了。总之，不能用现代人（或西方人）的思想认识（或思维方式）去代替中国古代人的思想认识（或思维方式）。这种不顾历史的搞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小手法，不花力气的没出息的自我表现。既然搞的是历史，搞的是建筑历史，就得搞清楚它本来的历史面貌，去恰如其份地说明它。你可以不同意它，甚至批判它，扬弃

它，但你不能不承认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它的影响，它对文化各个领域里的渗透和制约作用。建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把握得很好，挖掘得也深，分析得也尽情尽理。

再举个好多人人都大惑不解的例子，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不大力发展砖石建筑，致使砖石建筑始终处于支流地位？是我们的先人不善于搞砖石建筑，还是某种固执的偏爱？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仅仅从技术和非理性固执的偏爱上找原因，肯定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易》这个文化大框架中寻找，才能说得中肯，才能切中要义。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由阴、阳二气和木、火、土、金、水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文献中也有称做“五气”、“五材”和“五部”的），通过阴阳的消长变化和五行彼此间相互循环，相互作用，即所谓“相生”、“相克”衍生出来的。朱熹老夫子对此说得十分透彻。他说：“阴阳五行，七者袞合，便是生物的材料。”^①他还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二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抄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②这就是阴阳五行的所谓哲学基础。今天看来当然很不科学，甚至荒诞不经；但在古代它在推动我们先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方面，却是起了作用的。它曾被中国古代许多哲学流派所吸收、消化，构成各自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一环。

从总体看，大约可以说阴阳五行对中国古代人的思想

①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② 同上，卷一。

和行为有着非同寻常的制约意义。我们的先人还把诸如颜色、方位、季节、事态、礼仪、味觉、声音和人的内脏，以及天上的星星统统分类或还原到五行的五个元素里。总之，人所感知到的和一切活动无不被纳入五行之中。建筑是人类至为重大的活动之一，当然也要受到五行的制约。

譬如，东方——太阳升起的方位；青色——植物生长的颜色；春天——一年四季之初和清晨——一天的开始，都被分配到五行（或五气）中木（或木气）这一类里。这些充满了光辉灿烂、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内涵，自然是阳气的体现和生命的所在。那么，用木头来盖房子自然也就是阳气的体现和生命的所在了。中国人把活人用的房子称做“阳宅”，图的便是这个吉利。这种心态和行为明显地是受了阴阳五行制约的结果。

又譬如，五行中的土（或土气）被指定为有能使“万物归无（死）和万物出生（生）”^①的两层象征意义。它具有生死循环、生生不息的作用，有着阴阳两重属性。于是，用土（或土制品——砖和类似性质的石料）来建造此世业已“归无”，来世尚待“出生”的死者的故墓（即阴宅），在我们的先人看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斲木以为阳宅，垒土以作阴宅，古代中国人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人为的制约，谁也不想也无力去改变它。如此世代相袭便演成了一条铁的世俗法则，成了祖宗的遗训。

论技术，中国汉代便创造出了起拱发券和垒筑穹顶的技术。可惜，这一技术被长期用来建造阴宅，囿于地下只是为了保存那些棺椁和殉葬的金银财宝。这样，墓室的内部空间

① [日]吉野裕子《阴阳五行思想与日本的祭祀民俗》，《东南文化》1987.

并不需要太大，所需的技术难度自然也就很低，用不着花力气再去创造什么难度更大的结构形式和发明什么新的建筑材料（像混凝土什么的）。后来，佛到了中国。砖石建筑技术又被用来建造佛塔，开始为佛服务了。这大概因为佛是涅槃了的人，也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或境界）里去了的缘故。这个新的功能要求虽然使砖石建筑走出了地下，但也没能给它的发展带来多少新的转机。佛塔要求的只是高度，不是跨度。塔在使用上根本用不着很大的内部空间，甚至死膛儿的也行。这同起初善男信女们围着塔转圈子，礼拜早已涅槃了的佛有关系。再后，虽说有了登塔的要求，那也只是凭栏一望而已，也是在塔外，也用不着什么太大的内部空间。所以说砖石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思想意识问题。“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我的这个看法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攀附之嫌。因为，至少汉民族绝大部分地区及其绝大部分历史岁月里人们都是这样对待砖石建筑的。要说攀附那也是古人对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的攀附。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就是这种古人的攀附对建筑的影响，不是替它歌功颂德。建军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很有分寸，言之成理，研究得很有心得。

我前面谈的这两个例子，并没有论说阴阳五行、易经八卦本身如何的意思，也没有讨论《周易》里诸如“观物取象”、“象天法地”和术数、理气一类问题的意思，我只是想讲明一点：古代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把建筑容于《易》这个文化大框架（或系统）中来经营的，我们今天下点功夫（或有人）来研究它，还是必要的，如此而已。是以为序。

1990年9月写于东京法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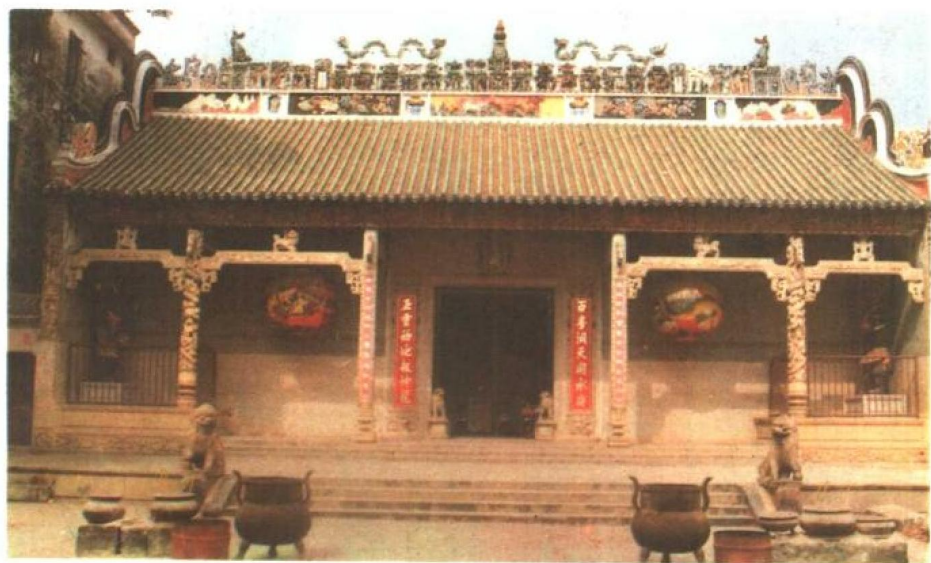
▲ 龙母庙前瞻



▲ 潮州开元寺天王殿梁架结构



▲ 登封告成镇周公测景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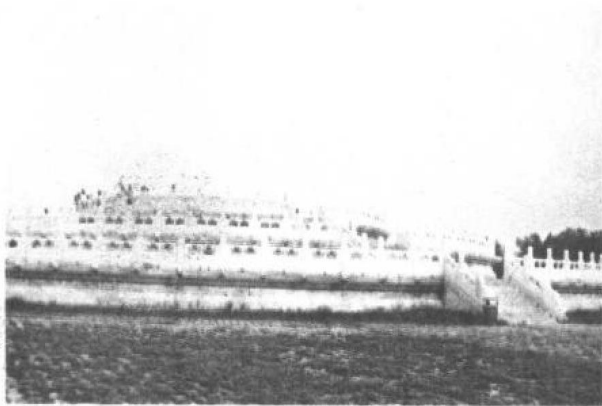
▲ 龙母庙山门



▲ 潮州某宅八卦门



- ▲ 应县木塔
- ▲ 龙母庙后顾
- ▲ 天坛圆丘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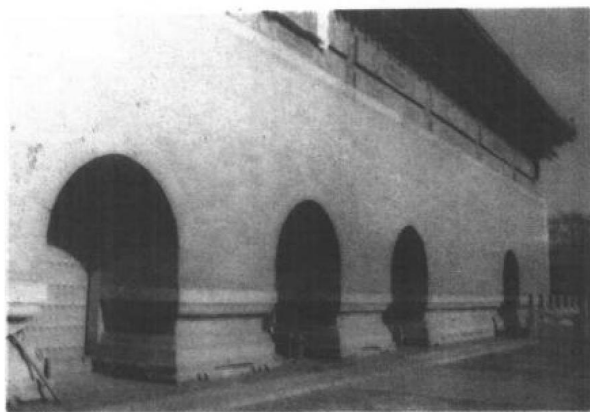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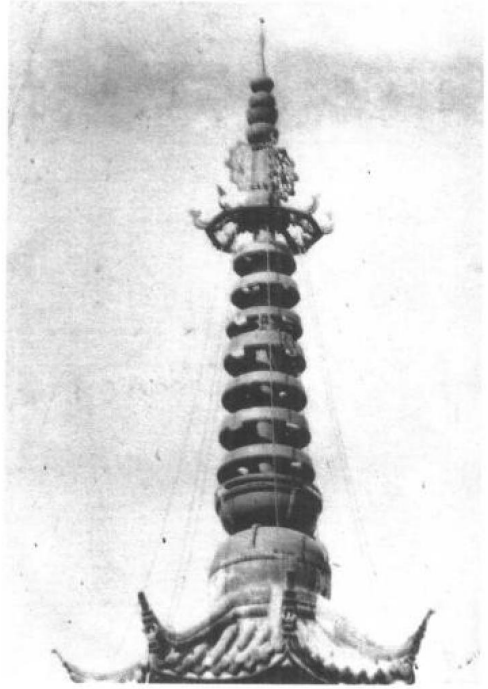


▲ 凹曲屋面—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

▲ 太和殿

▲ 皇家档案库—皇史宬





- ▲ 上海飞虹塔塔刹
- ▲ 泉州寿仁塔
- ▲ 祈年殿

